

论证与解释

——政治哲学导论


本书依据作者所提出的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
对中西政治哲学史进行了诠释和重构，
这种诠释和重构同时也表现自身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整体性理论框架。

宋宽锋◎著

宋宽锋◎著

论证与解释

——政治哲学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宋宽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309-07446-8

I. 论… II. 宋… III. 政治哲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6506号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

宋宽锋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212 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46-8/D·462

定价: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黄颂杰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政治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哲学直接源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探究,它首先关心的是“人事”、“救世”,为世间“治乱”,求取太平盛世的理想。“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主张。内在的修身养性可外化为安邦治国之术。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道”首先是内圣外王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中国哲学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首先也是如何使个人与自然、与社会合一、和谐相处。政治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面。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各种西方学术的热潮中,西方政治哲学引人注目。

西方哲学从产生起就关注人和社会问题。从古希腊哲学家到 19 世纪初的黑格尔,哲学家们都把伦理道德、社会政治融进自己的体系。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与他们的本体论、知识论是相互渗透融会在-起的。他们一方面引导人们超越感性世界追求存在的原理和真理,另一方面又引导人们关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在现当代,政治依然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德性、正义(公正)、自由、民主、权利、责任(义务)是各种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的热门论题。现当代的许多哲学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甚至超过了对传统本体论、知识论的研究,而政治学家则把政治理论提升到哲学的、形而上的层面。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在它被引进中国以后,也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大批西方政治哲学著作被译成中文,研究性成果也不断涌

2 论证与解释

现,但其中大多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介绍或评述,而宋宽锋的这部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则与此有所不同。

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首先在于它并不限于西方政治哲学,而是融中西哲学于一体;更有创意的是,它并非对中西政治哲学作一般性的介绍或评述,而是依据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尝试对中西政治哲学进行“诠释”和“重构”。这种尝试无疑是十分大胆的,但绝不是任意的、无根基的凭空想象,而是在对中西政治哲学进行整体透视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诠释”和“重构”的尝试,具体表现为“政治哲学的论证性概念框架”与“政治哲学的解释性概念框架”的提出,全书就是围绕这两种“概念框架”展开论述的。这种研究方式和进路显然不同于对政治哲学的惯常的“史学式”的研究方式和进路。作者认为,后一种研究方式致力于对政治哲学思想演进历程的“客观再现”或“客观解释”,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无法根本化解的内在局限”,那就是它不能从根本上建立和阐释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与研究者当下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之间的意义关联,也不能展开和实现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意义关联。而作者提出的对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方式和进路,其主要旨趣正是为了建立和展现政治哲学研究与研究者之间的意义关联。作者强调,对政治哲学的“史学式”或“观念史式”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是“不足”,而不是“错误”。因此,作者提出的对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方式只是对惯常的“史学式”研究方式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或“排斥”,或者说,是为了克服后者的“缺陷”。

何以“概念框架”的研究方式能弥补“史学式”研究方式的不足呢?“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是将那些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出场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历史关切和历史性的内容加以“抽象”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加以“纯粹化”,看作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政治哲学史就被“转换”成了各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相互遭遇、辩驳和竞争的“共时性”的思想舞台;这种“转换”是由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进行的一种思想操作,这个“共时性”的思想舞台是由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搭建的,各种政治哲学(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的“概念框架”与作

为研究者的“我们”，通过这个思想舞台就处在了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或“关系状态”之中。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可以让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思想舞台上展现自己，沟通和交流，论辩和争论，让它们在各个层面遭遇、竞争、互动。当然，各种政治哲学内容的“抽象”或“纯粹化”、“概念框架”的形成和“共时性”思想舞台的搭建，都不是任意的无根基的，而是取决于未被“纯粹化”的我们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历史情境，是“被我们所面对的特殊的问题、困惑和关切所规限和约束的”。作者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史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之间的“意义关联”，不是通过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提供现成的解答和教益来实现的，而只能在上述研究活动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和展开，也就是在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研究者当下对政治的思考（“日常的政治思考”）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

作者指出，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多种政治哲学“概念框架”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思考“政治”的角度、取向和方式。我们日常的政治思考也是多元的、多样的，表现出我们日常对“政治”思考的多种不同的角度、取向和方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相似性、一致性，又有程度上的差异，这就使两者之间建立意义关联成为可能和必要。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多元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作出了分类，将其区分为“论证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和“解释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通过对这两种政治哲学概念框架的研究，作者试图重构政治哲学史的理论图景，或者诸种“政治哲学概念框架”的谱系。

所谓“论证性的概念框架”就是致力于合理性的论证。合理性论证的依据之一是“事实”，即人性的事实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实际状况。作者把霍布斯、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论、休谟的政治哲学和哈耶克的政治哲学都理解为论证性概念框架。合理性论证的另一个依据是“价值”，即以价值为基础和根据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都是以价值为依据的论证性概念框架，虽然他们的价值理念并不相同。伯林提出的价值多元论，使以“价值”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面临理论困境，而以“功利”为终极价值的功利主义也不能解决这一困境。上述两类论证性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以某种正义原则或者制度框架的构想及其合理性论证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的政治生活中，

4 论证与解释

统治者的政治技艺、“为政之道”或者“治道”也成为政治哲学的合理性思考和论证的主要对象。因此,作者对“论证性概念框架”的考察和论述便包括了对“治道”的构想及其合理性论证。作者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有关“治道”构想的内容,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内容则“是合理的制度框架的思考、构想和论证,是正义和正义原则的思考和论说,是思考‘政治’的概念框架的建构”。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治道”的构想和论说。因此,该书关于“治道”的构想和合理性论证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诸种“治道”构想和论说,包括儒家、法家等。上述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的依据有“事实”与“价值”之分,但作者强调,事实与价值之分并不是绝对的。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不是单纯的经验事实的考察,也不是单纯的价值合理性思考,但它又不能摆脱对“事实”的依赖和对“事实”的厘析,不可避免地关涉价值的评价和考量,而且,这种论证虽然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算,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作者还指出,论证性的政治哲学概念框架不同程度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性,我们是在普遍性层面上揭示和展现合理性论证的根据、理由和论证结构的,而我们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则具有特殊性,因此这两者之间的意义关联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如上所述,政治哲学的“论证性的概念框架”最终都指向某种制度框架或者治道的构想及其合理性论证,不过,不管政治哲学家构建和设计了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或者治道,也不管政治哲学家对此给出了什么样的合理性论证,他们的构想和设计都不可能与现实存在的制度框架或者治道完全重合,两者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消除的距离和反差。就此而言,政治哲学家所构想和设计的制度框架或者治道,在中性的意义上,就是一种“理想”或“应当”。“理想”或“应当”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方式的问题也进入了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的视野之中。作者对中西政治哲学史上回应和解答“理想”实现的可能性问题的不同的理路和方式进行了考察和透彻分析。但是,不管是在历史哲学(黑格尔)的视野之中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是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之中对“理想”实现的条件和机缘的思考,都不同程度地导致政治哲学的探究从“论证”转向“解释”,甚或走向对“论证”的反观、审视和偏离。因而,对中西政治哲学史的诠释和重构也就转向了“解释”和“解释性的概念

框架”。

作者认定,孟德斯鸠、黑格尔和奥克肖特的政治哲学是“解释性”的,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性的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通过对他们的政治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作者指出,对“政治”的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是一种合理性的解释”。那么,对政治的解释性概念框架的依据是什么呢?作者首先提出了“人性”概念。在对人性做出经验论的解释过程中又引出了“常人”的概念,作为对政治生活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的“内在根据”。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性”和“常人”概念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即不能以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来理解它们。“常人”看似取自海德格尔,但其含义和指向都不同于海德格尔对“常人”的分析。人总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常人,政治行为的主体是常人,政治社会是一种“常人社会”。作为政治生活现象的常人的政治行为,以及作为“常人社会”的政治社会的具体样态,都是被相应的制度框架所规定和约束的。所以,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也就成为理解和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现象的“外在根据”。正因为如此,对社会政治生活现象的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即对政治生活现象的“合理性解释”,又总是延伸到对相应的社会制度框架的合理性解释。作者依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圣王创制说”(荀子)、“因势创制说(势论)”(柳宗元、王夫之、冯友兰)和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条件机缘论”以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关于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深入探究和解析了制度框架创生的缘由及其方式,并由此对制度框架的历史合理性进行解释,在解释中探讨了制度框架的变迁和转型。

概而言之,在这本政治哲学的专著中,作者把“论证”和“解释”看作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两种基本方式,把“论证性概念框架”和“解释性概念框架”看作政治哲学的两种基本的理论形态。按作者的总结,“论证”与“解释”之间的理论整合和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两者之间却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论证”与“解释”共存互补,各自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功能。我们在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也在“论证”与“解释”这两种基本的思考方式之间进行着转换。通过“论证”与“解释”,我们“哲学地”思考着“政治”;在思考中过着一种政治生活,并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的动物”。

我之所以在这里将这部著作作这样一个概述,是因为我在读这部著

作的打印稿时,感觉到作者写得有点“与众不同”。他不像时下流行的政治哲学专著那样,将各个或某个人物和学派、各种或某种学说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论述,而是将古今中外的有关政治哲学家和他们的学说理论置于“概念框架”之中进行分析论述。这份书稿作为学术理论读物,当然不可能像文学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但当我读进去后却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就想着要弄清楚书稿的进路,当然也就是作者的思路,想看个究竟,于是就有了上面的概述。关于对这本著作的评价,尤其是两个“概念框架”,其意义和价值的优劣高低,正误是非,我想应该由读者自己作出。在这里我还想再简略谈一些读后的感想。

强烈的问题意识是这份书稿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感受和印象。全书从问题开始,以问题为结语,各个章节的论述均以问题为导向,层层推进。作者正是在不断地“询问”之中进行分析,展开论述的。但也不是像教科书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给出答案。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更多地是针对问题,提出看法、思路,启迪人们去进一步思考。我们看到,在中外哲学史上,举凡提出创新理论的哲学家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的学说都是在问题的导引下,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创新。我们可以看到,这本著作完全是由问题贯穿起来的。如果说这本著作有什么新意的话,那么,这些新意就完全是在问题的导向下产生的。作者提出以“论证性概念框架”和“解释性概念框架”对政治哲学史进行“重构”和“诠释”,就是针对着政治哲学研究者和政治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意义关联”这个问题。透过这种问题意识,透过这种不断追问式的论述,我们也能构想出一位勤勉好思的学者。就笔者所知,宋宽锋就是这样一位好问好学好思的学者。应该承认,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各种看法都是有一定依据的,而且都是经过思考研究的。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对各种问题和观点的论述都是很自信的,但并不自负,并不自以为是,并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人接受。事实上,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看法是否合理、是否对路、是否正确,提出反问,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是学术进步的一种推动力。我想,如果这本著作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思考和提问,并能展开讨论,那该是著作者的愿望和快乐。

这部著作的中心是两种概念框架,但我们在概念框架下也看到一大

批有血有肉的中西哲学家。就我所知,国内现有的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性论著几乎都是或有关中国哲学的,或有关西方哲学的,将二者融汇起来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一批学者走上了融中西学术于一体的道路,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本书作者宋宽锋显然也走上了这条路。他在硕士、博士阶段都攻读西方哲学,这方面的功底很好,近些年来,他刻苦努力,研读中国学术经典,探究中国学术思想,日积月累,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本书中他将中西政治哲学融汇一起进行分析的方法和思路是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学科壁垒是我国学术界的通病,依我之见学科壁垒之中最严重的则是中西之间的壁垒。中西文化学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西方传教士,而两者真正产生碰撞、交融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还是从20世纪初开始。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人文社科学者是贯通中西的。就拿我的导师全增嘏(1904—1984)教授来说,他自幼熟读经书典籍,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同时又接触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精通英语。1923年至1927年他留学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在国内学术界全先生以精湛的英语和深入的西方哲学研究著称,而事实上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研读绝不亚于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研读。像全先生这样贯通中西的学者在我国有一大批。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学术界全面向苏联学习,学科壁垒、中西分割也越来越严重。像全增嘏这样的学者都未能把积累深厚的中西学识发挥出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随着中西文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学者们也越来越多认识到学术上贯通中西的意义和价值,一批学者踏上了这条道路。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创世界一流,我认为,造就一批贯通中西的学者应是其中的重要内涵。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学术,而学术应该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独特的品格。譬如:求真求是,不仰仗权势;造福人类,造福社会,而不崇尚财富,不迷恋金钱。学术是实实在在的事业,决不能弄虚作假;学术是真真切切的工作,容不得忽悠欺骗。学术崇尚真实性、客观性、自由争鸣、不断创新,学术的品格也应是学者们的品质、人格。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者,他必须爱国爱人民,他也应该仗义执言。学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但学术的进步、发展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学术的发

8 论证与解释

展要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个内在动力就是我们学者的使命感、责任感。一个真心诚意从事学术事业的人,必须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命,成为自己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刻意追求功名利禄。从事学术事业的学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这是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内驱力。我相信宋宽锋是具有这种内驱力的学者,在我国,这样的学者群体正在不断壮大。

是为序。

目 录

序	黄颂杰	1
导论：政治哲学史的诠释与重构		1
第一节 学术与政治		1
第二节 哲学与政治		5
第三节 政治哲学史的学术研究		12
第四节 作为概念框架的政治哲学		16
第五节 政治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日常的政治思考		20
第六节 论证性的概念框架与解释性的概念框架		25

上篇 论证性的概念框架

第一章 政治哲学论证的可能性及其前提		31
第一节 实力政治观与政治哲学论证之可能性的质疑和否定		31
第二节 实力政治观批判与政治哲学论证之可能性的前提		35
第二章 事实与论证		39
第一节 作为论证性的概念框架的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		39
第二节 作为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之基础的人性与自然环境的		51
第三节 无知的事实与自由的论证		57

2 论证与解释

第三章 价值与论证	63
第一节 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性概念框架的理论缺陷	63
第二节 价值预设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	65
第三节 价值多元与政治哲学合理性论证的困境	72
第四节 价值多元与作为终极目的的“功利”	80
第四章 “治道”构想及其合理性论证	87
第一节 “治道”概念的辨析与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	88
第二节 “治道”构想及其合理性论证的理路和根据	99
第五章 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日常的政治思考	107
第一节 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的根据和性质	108
第二节 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	114
第三节 论证性的概念框架的普遍性与日常的政治合理性思考的特殊性	120
第六章 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与历史哲学的转向	128
第一节 论证与苦恼	128
第二节 历史哲学的转向与政治哲学的合理性论证的扬弃	134
第七章 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和机缘	139
第一节 理想的构建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问题	139
第二节 理想实现的条件和机缘	142

下篇 解释性的概念框架

第八章 从论证到解释	151
第一节 由论证转向解释的缘由及其理路	151

第二节 政治生活的理解与解释性的概念框架	157
第九章 “常人”概念与政治生活现象的解释	169
第一节 “人性”的经验论解释与“常人”概念	169
第二节 “常人”概念与政治生活现象之理解的内在根据	176
第十章 常人社会与制度框架	181
第一节 制度框架与政治生活现象之理解的外在根据	181
第二节 政治生活现象的合理性解释	184
第十一章 制度框架创生的缘由及其历史合理性解释	193
第一节 制度框架创生的缘由及其方式	193
第二节 制度框架的历史合理性解释与制度变迁	209
结语：论证与解释	217
后记	219

导论：政治哲学史的诠释与重构

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当我们学习和研究中西政治哲学史，面对中西政治哲学史上各种各样的关于“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论说的时候，却常常茫然失措了。诸种对“政治”的哲学思考和论说，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诸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理论与我们当下的政治思考，又有什么关系呢？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学习和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呢？我们又应该期待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那么，就让这些问题引领着我们进入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和诠释，从而也使我们走上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的道路。

第一节 学术与政治

对政治哲学或政治哲学史的关注和研究，仿佛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基本思想动向之一，以至于位思想者做出了这样的断言：“我估计政治哲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成为中国的重要显学。”^①但是，当我们关注和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呢？也许像被饥饿所折磨的人心急火燎地寻找食物那样，寻找改良现实政治的具体方案，并试图在政治哲学家或者至圣先师的字里行间里发现答案；也许你对现实政治有着太多的批判意识和不满情绪，而政治哲学家和至圣先师对“政治”的高屋建瓴的审视和评判，为你的情绪提供了发泄的出口和渠道；也许你是一个从

^①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事政治的人或者一个“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希望政治哲学家能够告诉你一些明智的政治技艺;也许你是一个试图从事政治的人,甚至把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作为你的理想,希望像张载一样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期待着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至圣先师的言教,能够使你成为这样的人杰。这里,我们无意对所有这些期待进行评判,我们只想指出,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常常很难满足诸如此类的期待;或者说,即便这样的期待在对政治哲学史的“解读”和享有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它与政治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也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关联。

在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时候,以上的诸种期待或有极端和偏颇之处,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大致说来,不管就其相对极端的或温和的表现形态来看,以上的诸种期待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或者说,是以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学术”为指向的。在以此为目的和指向的政治哲学“研究”或广义的对“政治”的思考中,“研究”或思考就成为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的前奏和铺垫,仿佛“研究”、思考或者相应的思想操练是一个人获得从事政治和改变世界的资格的依据。

而如果这种以“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为指向的思维定势,我们觉得并不陌生,甚至还觉得特别自然,那么,我们似乎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追问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更易于接受和具有这样的思维定势?不过,全面而又系统地讨论和解答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我们将仅限于从哲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稍稍涉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提供几个例证。就此而言,如果我们更易于接受和具有这样的思维定势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由此推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哲学和文化的传统可能更为突出地具有和体现了这样的思维定势。是否如此呢?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曾有这样的论述:“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学——基本上属于‘改变世界’的类型。儒学当然也有‘解释世界’的成分和其他的成分。但是当作一种社会、政治哲学来看,儒学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安排秩序,或重建秩序(在秩序已不合理的情形下)。程、朱之所以定《大学》为儒学的总纲领,其用意即在于此。这种‘改变世界’的性格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虽在乾嘉考证学鼎盛之际,第一流的学人仍未忘‘经世’的目的。晚清的经世运动汇结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尤其可以说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儒学内部存在着‘改变世界’的强烈要求。严译《天演论》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提供了‘科学的’根据。”^①当然，不仅儒学的传统是这样，法家、墨家以及道法合流之结果的“黄老之学”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庄子》这样的道家与道教和佛教，其学或其教之宗旨或核心价值指向，虽具有与“政治”离异之性质，但不管是逍遥自适之真人，还是修道成仙、长生久视，或者修证成佛、普度众生，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学术”为旨归的。而就一般伦理政治的思考和言说来看，中国的思想传统就更是如此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学者萧公权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在论及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时写道：“黄、顾深惩宋明专制之弊，故欲以封建分权之遗意矫正集权。船山立论则不专对一时一代之得失而着眼于政治进化之客观事实。前者乃改造家之主张，后者则近乎科学家或历史家之案语。吾国往昔不乏改造之思想家而较少纯粹之学者。”^②当然，像王船山这样个别的文人士大夫，由于历史的特殊情境和个体性的特殊机缘而被迫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及其得失做出了一些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性质的讨论和认识，但这毕竟是例外，而非常态。在这样的文化和哲学的传统之中，虽然对“政治”的思考和言谈可谓洋洋大观、绵绵不绝，但大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改造家”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论说，而较为缺乏对“政治”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进一步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繁复多彩的政治思考和政治思想，较少具有“政治哲学”的意味。进入 20 世纪，虽然两千年之帝制覆亡，现代大学制度逐步确立，学者也逐渐地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概观现代中国之“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学者，也实在不乏“以天下为己任”之心态从事学术研究者，或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游移的人。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复观，他的一本“论文集”也耐人寻味地被命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当然，我们恐怕也不会忘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哲学和文化传统之特性的论述，并不是全面的和

^①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71 页。

^②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 年，第 41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86 页。